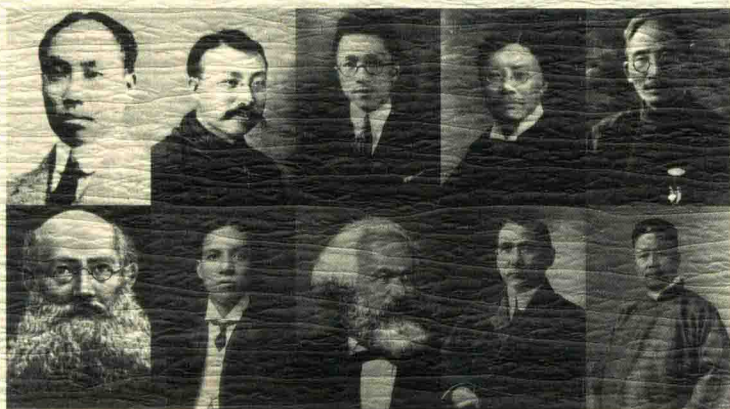




1919—2019 百年五四：
共同的文化精神家园

五四 那些思想

刘大胜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1919—2019 百年五四：
共同的文化精神家园

五四那些思想

刘大胜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刘大胜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五四那些思想 / 刘大胜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9.8

(百年五四: 共同的文化精神家园)

ISBN 978-7-5470-5174-0

I. ①五… II. ①刘…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 IV.

①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47452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6mm × 210mm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12.5

出版时间: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朱婷婷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范 娇

版式设计: 马婧莎

ISBN 978-7-5470-5174-0

定 价: 53.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521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24-31255233

作者简介：

刘大胜，内蒙古赤峰市人，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代表作有《重读摄政王载沣》《留鸟：北方乡村的生命纪实》等。

《五四那批人》
《五四那些事》
《五四那些思想》
《五四那些经典》

封面设计：范 娇
版式设计：马婧莎
责任编辑：朱婷婷

引言：一百年的轮回与纠结

黑格尔有句名言，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最无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些名词已经成为历史的印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稍有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但是知道并不等于了解，更不等于深知，即使是社会精英也未必真知其内涵要义，了解其来龙去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意义自不待言，带给中国极大的变化。但回顾过往，又审视当下，一百年的历史好像一个轮回，部分事情还停留在起点，并没有因为时空的改变而出现本质性的转变。更关键的是，五四所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很多问题的探讨依然停留在初始阶段。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如何实现民主与科学、如何与世界接轨，依然是有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必须考虑的内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不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出发，寻找历史的借鉴，提供历史的思考，探究历史的价值。

一、当年的风潮与思潮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以抗争洗刷屈辱，需要科学理性的指导。理论可以成为一种风潮，也可以成为一种思潮，改变着中国社会。风潮和思潮的兴起都是有理由的，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大地已是风云变幻、新旧更替之象，爆发了一场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终结，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连同所依托的意识形态一并散落。民主主义者怀着美好的愿望迎来了中华民国，却不幸只得到一个空壳，得不到真正的民主、科学、自由、博爱、平等。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结束，袁世凯接过全国的军政大权，成为民国初期的一位军事强人。

长于权术的袁世凯纵横捭阖，很快瓦解了革命党的反抗。随后开始一系列倒行逆施，帝制自为，发表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试图借孔子的余威为一个摇摆不定而又野心勃勃的政权充门面。孔子再次成为一种符号、一个招牌，着眼点却不在传承其精华。他们只希望为自己插上一面冠冕堂皇的旗帜。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无孔教无中国的谬论。

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数不清的军阀混战，脆弱的民

主宪政被损耗殆尽。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认为正是西方思想引进得不彻底、不干脆、不全面，才有了一系列的专制回流。只有全面引入新思潮、进行彻底的启蒙，才可以改造国民性，让民主、科学扎根中国，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于是有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走上历史前台。

陈独秀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往真正的民主，致力于批判传统的社会伦理和思想观念，消灭传统的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词《敬告青年》中说，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陈腐朽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给新鲜活泼者空出空间的位置及时间的生命。人体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就会健康，陈腐朽败的细胞充塞人体，人就会死；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的人充塞社会，社会就会亡掉。这是一份饱含激情与深思的发刊词，奠定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调——昂扬向上而富有战斗力。

陈独秀希望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个方面可概括为向往自由、追求进步、积极入世、放眼世界、现实理性、相信科学。《敬告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二者是检验政治、法律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的准绳。中华大地再次吹响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号角，引领人们走向现代化。

《新青年》也由此影响了几个时代的青年。以往知识分子的行动力比起思考力总是有所欠缺，新文化运动是个例外，

轰轰烈烈而掷地有声。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时,《青年杂志》正式更名为“新青年”。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发起猛烈的冲击。

同时,一批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具备现代民主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关于新旧文化之别、中西文化优劣和中国文化发展,成为讨论重点,改变原有知识分子的组成结构和价值观念。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白话文运动的讨论在海外就已萌芽,在与反对者的论辩中逐渐成熟。海外留学生注重筹建专门探究学理的学会,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这些都为中国的学术改造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新动力。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倡导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邀请了很多有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打破大学内升官发财的官僚痼疾。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学术科研的机构,所谓的研究不仅包括介绍、输入西方文明,更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以科学方法研究国粹,不能抱残守缺,仅仅保存国粹。

哲学里的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里的理想派与写实派,经济里的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的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的乐天论与厌世观,都能在大学存在。这是思想自由的通则,因为有此才可以称为大学。大学主导者不应该是行政官员,而应该是教授。学生不应该把学校当作进阶之梯,而可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聘请胡适、刘半农等人来校任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章太炎门生和某籍某系掌控的局面。陈独秀进入北大,把《新青年》也带来,李大钊、

胡适、鲁迅等人成为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一时间，崇尚新思想、新文学、新文化的新人聚集在北大，《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全国范围内有指导意义。

1917年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传统的文言体系不单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正统文学观念的呈现，承载着文以载道的理念。陈独秀和胡适提倡白话，不仅改变了文体，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一改革伴随着长久的论争，林纾尖锐地反击，甚至对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也提出质疑。但是，文言文的衰落和白话文的兴起已经无法逆转，国内兴起很多白话文报刊，《新青年》也由文言变为白话，一大批新式作家和评论家出现。

文化的革新和思想的进步必然带来人们观念的转变，其始也微，其力渐大，在很多历史的关节点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当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悲愤、不满和焦躁。以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师生走上街头，极端失望之下火烧赵家楼，痛打所谓的卖国贼。随后，全国各地的学生风起响应，形成了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提升了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影响力，促进了多种政治思潮的广泛传播。之前还停留在知识分子小圈子，之后成为全国范围内关注的思想启蒙运动，影响的深度、广度均有大幅拓展。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妇女解放、国故整理、文学改良等思潮蓬勃发展，思想的革新成为时代风尚。只要是对文化稍有关注的人，几乎都会注意新文化运动

的动向。五四精神铸就了五四青年，成为未来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

五四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称，甚至以五四精神代指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要义。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本就存在思想分歧的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在五四运动后出现大分裂，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甚至是整个政局的走向。一派人以陈、李为首，倡导建党，引进苏维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作为武器。一派以胡适为代表，依然坚持原来的自由主义，倡导依靠个人的自由、独立、解放，进而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

这是改变中国的两种思路，由此带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更是让两派人的纷争全面爆发。一派实现了从个人主义到阶级解放的跨越，一派还在坚持原来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原来一个战壕的战友渐行渐远，几乎对所有的公共话题都出现对立。一种思想好比一面旗帜，只要大旗树立起来，自然会有千千万万的追随者跟随旗帜前行。全国崇新的知识青年同样出现分裂，从此缺乏一个心平气和的探讨态度和实际存在的探讨平台。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笔锋从来不是善茬，言辞半是理性半是感性，很多时候还故意挑起纷争，这是弱者的惯性逻辑。只要唤起众人注意，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并不重要。新文化阵营的刘半农和钱玄同自导自演双簧，讥讽前辈学人，一方面是为了表达个人理念，一方面更是为了唤起社会关注。林纾不甘示弱，公开发表《荆生》和《妖梦》，一场笔墨官司掩盖

了学理讨论，流于谩骂和讥讽。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有不假辞色的反感、讨厌、批判与讽刺。

新文化运动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存在着新与旧之争，与学衡派等人存在新与新之争。各种争论推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也带来了思想的分流。其后的国民革命和国共纷争并没有消除这种争论，而是加剧了这种争论。新文化运动成为各方讨论的重点，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绕不开的学术问题，每一个名家对此都有一定的评判和反思。是耶非耶，都成为学术界再次讨论的内容。

二、三种评价与三种思路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源自学人的主动性，文人靠一个大脑、一支笔、几本刊物，引入西方现代民主思想，摧毁桎梏国人心灵的枷锁，进而改造国民性，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人反对的对象基本一致，初步采取的方式也基本一致。但目标的相同并不能弥合观念本来的不同，新文化诸人的思想认知、价值体系、学术观念和理想抱负本来就不一样。出发点一致，并不能确保共同走向终点；敌人相同，并不代表真的志同道合。观点因人而异、因学术而异、因时空而异、因理念而异。

彼此之间的分歧不但表现在政治层面，也表现在学术层面，几乎在各个论题上都对立。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突出表现，究竟是一劳永逸地运用一种理论解决所有问题，还是一个个、

一点点、一步步地逐渐解决问题，根本无法调和。这是本体论上的差异，也是方法论上的不同。思想分歧无法弥平，诸位先贤分道扬镳，追步他们的学生一辈，即所谓的五四青年也随之分流。不但内部分裂如此，外部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也是千差万别，部分五四青年或者倾心新文化运动的人走向了对立面，影响甚巨。

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成就、价值、意义以及真正的领导者成为讨论的重点，直到现在也没有终止。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始终笼罩在新文化运动探讨的问题里。似乎所有党派和流派都在争夺这场运动的诠释权，似乎谁掌握了这个诠释权，谁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和合法性。各种混乱庞杂的阐释中，留美华人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采取的三种分类方法，基本被学界继承，只是此与彼略有差异。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主要的三类，分别有支持者和延续者，彼此之间的观点在某些地方有重叠。

第一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话语体系。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阐释始终以毛泽东的论述为准，将五四运动划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命的起点。重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由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进而探究其文化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点，也是高校思政课的核心理念。

相比胡适等人，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时，就注重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将其看作是新文化运动在政治层面的自然影响，但开始时并没有宣示这是由十月革命激发，仅将其笼统地看作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等到真正接

受从苏维埃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后，陈、李等人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新文化运动，尤其针对文学改良运动。

陈独秀认为，白话文运动由自己和胡适等人闹出来的观点，是对历史人物的不虞之誉。近代经济发展，产业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顺应这个需求而发生而存在。胡适一生以白话文运动自傲，强调个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对自己和其他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甚至夸张地称吴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反对视经济为第一位原因的看法，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和陈独秀的主观努力，白话文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这与陈独秀有根本不同。

1927年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或退或死。党在一段时间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并不一致。直到毛泽东到了延安，陆续写了多篇文章，才延续陈、李重新建构了一整套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之前是旧民主主义，领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革命党，文化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的斗争；之后是新民主主义，领导者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尤其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之下发生的。正所谓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找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新武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矛盾，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开启

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四运动也被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的浮雕之一，成为革命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思政教科书上，五四运动从属于“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论说模式，《新青年》被当成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更是让这套革命话语体系充满了一定的学理性。直到现在，毛泽东确立的革命话语体系依然没有太大变化，成为中国正统的历史观，被讲授给任何接受教育的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

第二种观点是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自由主义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新潮》编辑选用的英文刊名即“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宣示中国所进行的这场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某种相似之处，同样是以理性反对传统，以自由反对权威，以人的基本价值反对压抑人性。

这一派主要人物包括胡适等自由主义分子。胡适明确讲，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必要途径。这种观点更强调运动的启蒙性，重视人的精神解放，注重自由主义的引入、传播、培养和完善，排斥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希望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来实现整个国家的独立富强。

自由主义者经常引用西方经典来诠释个人见解，重在挖掘个性独立、人格平等和思想自由，这一点既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传统文言体系体现着

中国古代正统的政教伦理观念，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表面上看是一种文体的单纯改变，实质则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带动了思想革新和个性独立。

这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留给后人的长久价值。但是以西方某种事件来比附中国发生的具体事件，总是让事件本身涂上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子。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思想固然大部分来自西方，但中国自身的独特性不容忽视。西方思想如何植根中国，不是几篇文章、几本刊物、几种思潮传播所能改变。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价值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被后来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尊崇。港台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自由主义传统没有断绝，一直以胡适为精神领袖，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重视其自由主义的一面。这一点在殷海光、周策纵、余英时等人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呈现。

第三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以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其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过激的文化运动，负面远远大于正面，是一场文化灾难，甚至掀起了后来激进主义的滔滔巨浪。自由主义者追求自由民主，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当然激起了部分中国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反感。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深蒂固，其中又伴有民粹主义的幽灵，只有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动员，才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唤起更多人

的革命热情。

孙中山生前基于政治原因，对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保持一定同情，但是出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原则，并未完全赞成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思想。孙中山的这种矛盾态度，给国民党内部人士解读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模糊空间。曾经参加五四运动和认同自由主义的部分国民党人，或多或少对胡适保持尊敬，认为胡适是国民政府善意的批评者、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与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的最终目标一致。胡适也有类似的思维，认为国民党即国民政府的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当然，国民党对五四的部分好感在 1927 年出现重大转变。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领导人，早年也曾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有过好感。但是随着地位的上升和思想的定型，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感越来越深，仅仅承认五四运动是以民族主义反对军阀和列强，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远远大于建设。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盲目地推崇外国思想，中国人因此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内在气质。

蒋介石以军人自诩，以民族领袖自期，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虽然其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大陆从来没有真正地贯彻领袖意志。他认为新思潮腐蚀了青年的思想，让他们在激进的革命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他把民主精神阐释为纪律，将科学的意义阐释为组织，认为只有纪律和组织才可以挽救青年、挽救社会、挽救时局，这完全违背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终其一生，他对胡适等人保持名义上的尊重，并无